

我写我书

我为什么要写宋神宗与王安石

吴钩

在撰写《宋仁宗：共治时代》的时候，我便定下了下一部宋人传记的主角—宋神宗与王安石。

按规划，我准备给四位北宋君主—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与宋徽宗立传，通过对这四朝君主活动的梳理，将整个北宋史串联并完整呈现出来。其中，《宋仁宗：共治时代》已于2020年仁宗皇帝诞辰1010周年之际出版。

之所以选择先写宋仁宗，是因为在宋朝诸帝中，仁宗是最赞赏的一位；而在历代王朝中，仁宗朝“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也是最开明、最接近现代价值观的政制，值得我们好好讲述。

为宋神宗与王安石立传，是因为在宋朝士大夫群体中，王安石是我最崇敬的一位，神宗也是我欣赏的宋代君主之一；而始于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之一。

我们可以将古代士大夫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大致来说，苏轼是一流的诗人、文学家，但学术、事功略逊；司马光是一流的学问家，但在文学、事功方面则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王韶是一流的军事家，但文学与学术方面并不出色。

那王安石呢？他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王安石曾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

不过，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王安石的学术（经术之学）与文学（文章之学），而是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朝执政大臣的事功，简而言之，就是



是王安石变法。

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仁宗时代的“嘉祐之治”与神宗时代的“熙丰变法”是相互悖反的，你怎么会同时推崇宋仁宗与王安石呢？

从某个角度来看，仁宗之政与神宗之法确实是相反的。仁宗倾向于无为而治，而神宗则欲大有为。“嘉祐”与“熙丰”分别代表了宋朝士大夫两种不同的施政主张、方针、路线。

但在在我看来，仁宗之政代表了古典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范，而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神宗与王安石主观上不可能有“近代化”的概念，但在客观上，变法与近代

化转型的历史方向是暗合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历史维度同时对仁宗之政和神宗朝的王

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评价，正如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签下《大宪章》，意味着理论上王权受到限制；而在十六世纪的都铎王朝，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却是王权扩张的一个过程，今天人们也是从不同的维度正面评价英国的这两个历史时刻，而完全不觉它们背后的悖反。

本书的主旨，不仅是想叙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以及他们君相相得的关系，更想着重描述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自宋朝以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为了避免与前人的叙事角度重复，我翻阅了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论著与传记。

翻看下来，不难发现，今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叙事与评论基本上都是采用鸟瞰式的视角，以粗线条勾勒变法的大体经过与新法的大致内容，然后对变法作出或臧或否、或褒或贬的评价，这些臧否、褒贬的评价又多半是由作者的意识形态预先决定的，并不是基于史实总结出来的。

而阅读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史料，我们却会发现，变法的具体过程与细节，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和互动，围绕变法展开的新旧党的冲突，可要比今人的鸟瞰式粗线条叙事生动得多，甚至比虚构的历史小说还精彩。为什么写王安石变法史的人不肯好好讲故事、摆事实，而要急于发表意见呢？

我决定采取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述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这个角度

其实也不新鲜，只不过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故事本身，回到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如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忠实地记录史实，不急于做总结陈词。

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的基本史实，再参考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王安石变法中波澜壮阔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格各异的角色。由于史实本身已具备足够的魅力，我有意大段引用史料中的人物对话，虽然是文言文，但比较晓白，阅读起来并无妨碍。

尽管本书侧重于叙述史实，但作者的史观与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在本书最后，我专门辟出一章结语，用来表述我对王安石变法的个人评价。这个结语究竟是画蛇添足，还是画龙点睛，评判权交给读者。

本书各章的标题，多取自宋诗，比如第一章“少年天子坐建章”，出自张耒《赠天启友弟》，我借来讲述神宗即位之初；第二章“还朝看拜富民侯”，出自陈造《呈章茂深安抚》，借来讲述王安石回朝辅弼神宗。有些标题为了更贴合内容，我更换了原诗句的个别字词，比如第三章“国柄今归王安石”，出自冯时行《送召客》，原句是“国柄今归谢安石”，我将“谢”字改为“王”字，恰好可以用来讲述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执政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标题是我自己杜撰的，因为在宋诗中实在找不到切题的诗句，只好用自撰的七言句子凑合着用。

本书完稿之时，恰值王安石诞生1000周年。谨以此书，纪念荆公。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上下册）》，吴钩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导语，有删改。）



汤素兰

我认识常瑞芳时间不长。七天前，在《寻找林木森书店》阅读分享会上，她送我一本她新出版的书籍《梅花落》。该书分为《泪渡》《鲜色》《花蕊》《放逐》《虚拟》《熏香》《烟雨》《半亩》《荏苒》九辑，是一部诗歌选集，也是常瑞芳数十年生命的记录与感怀。

诗集的内容非常丰富，体现出作家深刻的现实关怀。街市变迁、社会热点、旅途见闻、故乡回忆等等，在常瑞芳的诗中都有表现。比如，《你不见风在推窗》就写了水风井在时代浪潮中的变迁。而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豆腐渣工程、枪击案、城中村改造等，她都给予了关注。

人们一般认为，诗与远方相关，诗人超越尘世，但常瑞芳的诗关怀现实，写出了对弱者的悲悯，对于现实生活、社会变迁、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忧思。这些诗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情怀。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屈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就是我们诗歌现实关怀的源头。而且，作者的姿态，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普通民众感同身受，与大地上的植物、风景、村庄、街巷、河流发生情感的共鸣。

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常瑞芳的诗有大格局大气象。这一方面体现在诗的题材内容广泛，对现实社会深刻关照；另一方面是诗的内在情怀和格局，超越儿女情长和小我，表达了诗人对大地苍生的大关怀、大悲悯，对丑恶现象的大愤怒。一般的女性诗人长于写儿女情长，春花秋月，借物寄情。但常瑞芳的诗更多思考的是人存在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她是一个清醒者，也是一个呼唤者，正如她在诗中所言，“从圆明园的废墟到鸟巢世界的再度瞩目/中国有谭嗣同的慷慨，还有中国梦的道义/站着是所有人的热望。只要有人在场醒着/一切景观都将谱写进新的教科书/沉甸甸牵扯着我们木然的表情”（《如果有人在场》）。诗集里有不少这样的诗句，胸怀国之大者，批判社会沉疴，这是有力量的诗歌。

诗集有着独特的诗歌意象和富于个性的诗歌形式。她的诗句，取譬来源非常广泛，有日常生活事物，有山川大地上的人文景观，也有古今中外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等。比如：“乌云笼罩的不仅仅是心情/暴雨淋湿的身体在泥泞的路上行走/水漫了金山，终究过不去的法海/纸扎的风筝能否戳破一朵云/终究，曙光照在洞庭湖上”（《谁会在上帝身边寻觅你的灵魂》），在这段里有暴雨、金山、法海、洞庭湖等意象，随着诗人思绪的跳跃，各种看上去互不相关的意象纷至沓来，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常瑞芳颇具个性的诗歌语言。这些意象进入她的诗中，比贴切切而又现代，难怪有人说她的诗是先锋派写法。诗句叠加，让意象丰富，情绪饱满。诗的分行也很有特点，诗句标点不在句末，而是在诗的中间，诗歌任由情绪推动，有一种内在的循环，一首诗是一个大的循环，一节是一个小循环。诗歌的情绪从渲染、推升到回落，自然生成出她颇具辨识度的诗歌形式和戏剧性的诗歌结构。这一切无疑得益于她所受的戏剧文学影响。

常瑞芳的诗，不是工笔刻画，不是短句游丝，不是浅吟低唱，她的诗情绪饱满，但又不是直抒胸臆。关于常瑞芳诗的风格，我从诗的内在情绪中，想到她诗中出现的一个意象“火凤凰”，她的诗就是火凤凰的心曲，有着火热的诗情，凤凰一样的优雅，也有凤凰涅槃的疼痛与凤凰于飞的超拔。

“风花雪月借以抒发心中块垒/字里行间埋伏着意趣/或者干脆把诗歌别在衣襟/媲美那些/脖子上悬挂的钻石项链/布衣也是花团锦簇”（《和平时代的锦衣》），这是常瑞芳的诗句，是她关于诗歌的自白，也是常瑞芳的诗歌对于她自己和读者的意义。

常瑞芳用诗记录美好的人事，鞭策社会的阴暗与丑恶，疗愈自己的伤。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诗丰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发现生活的美，愤恨世间的恶，珍惜人间的温暖与光亮。

（《梅花落》，常瑞芳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悦读



书里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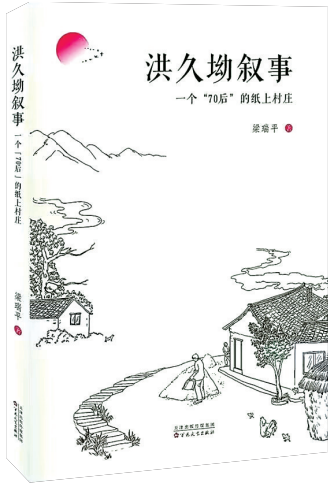
为卑微者立卷 为平凡者纪实——谈谈《洪久勘叙事》的美学意义

邱厚勤

近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洪久勘叙事》（以下简称《叙事》），是一部全方位展示梁瑞平乡土散文创作成果的结合。全书分为“一勘一风景”“一生一世情”“一人一世界”“一物一菩提”“一朝一夕间”五辑；另配有多幅线描插图，寥寥数笔，以图解文，重现了一些传统手艺与日常生活的场景，读来令人倍感温馨，唤起心中美好的记忆。

“为卑微者立卷、为平凡者纪实”，是作者创作《叙事》的初衷。该书通过转型期中国的一个普通村庄——“洪久勘”的纸上书写，复活了这个村庄普通人的故事，还原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群的真实面貌。综观全书，具有布局精巧、语言平实、情感诚挚的特点。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其彰显的美学意义有如下三大亮点：

其一，题材蕴念的乡土美。《叙事》一书，运用游子远离故乡的视角，审视故乡的一切，文中选取的全都是表现乡亲、乡情、乡思、乡恋、乡愁等故乡情结的题材，笔下所写也全都是故乡中的平凡人、平凡事、平凡景、平凡物。如“第一辑 一勘一风景”中《坐标鹿岐峰》《生我养我的洪久勘》《井这一辈》《樟树下》《消逝的易口渡》《珠矶滩》等；又如“第三辑 一人一世界”中《剃头匠李师傅》《木匠老舅》《裁缝兄弟》《砌匠大哥》《铁匠老李》《接生娘风奶奶》等，再如“第五辑 一朝一夕间”中《想念几头牛》《禾坪上的夏夜》《赶圩》《过年》《陀螺》



等。从上述列举的编目可以看出，作者独辟蹊径，自成一格，选择的都是乡土题材，蕴含着纯真淳朴的乡土美。

其二，叙事记人的质朴美。叙事与记人，是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叙事》一书中，多数编什是叙事记人，记述作者青少年生活的记忆，记述洪久勘过往今生的历史变迁，记述对乡亲乡邻的怀念怀想，记述民间工匠的人生百态，构建了一幅作者精神原乡的“清明上河图”。其行云流水般的文学叙事与记人，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文字雕琢的痕迹，应运而生是一种“清水出芙蓉”的自然质朴美。例如《溯江而上是故乡》开头一段：“世上的路有千万条，可是，几乎每个人，走了一辈子，也走不出故乡”。开宗

沈祖棻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几年前读过曼殊上人的这首诗，就对尺八箫憧憬着了。从凄婉的辞情中想像出幽抑的音节，尺八箫充满了诗意。在春雨的节季，娇艳的樱花红遍了明媚的岛国，和服的美人在楼中弹着伤春之泪，从绣幕珠帘里袅漾出一缕游丝般的颤抖，该是多么迷人的声音呵！

最近，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一间幽雅的客厅里，从留声机片上听到了尺八箫的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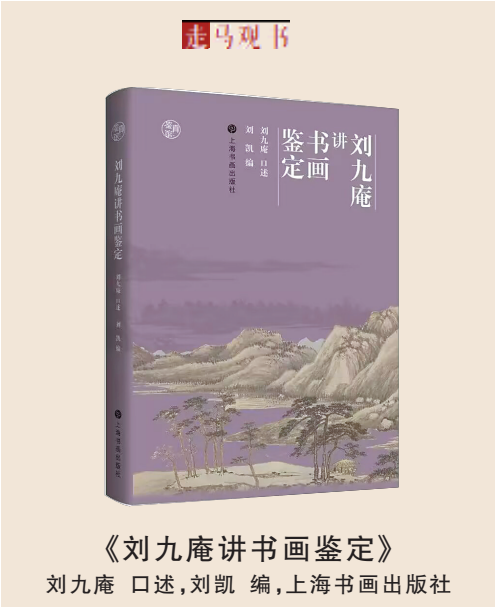
垂着流苏的宫灯在一角射出柔和的光线，将熄的炉火还留恋着残余的温暖，每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用祈祷者的虔诚，凝神地等待着。片子在机盘上开始转动了，破空而起的音浪打碎夜的静宁，尺八箫不断地震撼着每一个听者的心。

一缕凄厉的声音在空中缭绕着，盘旋着，有时连贯如成串的珍珠，有时凝咽如将死的寒蝉；忽然急迫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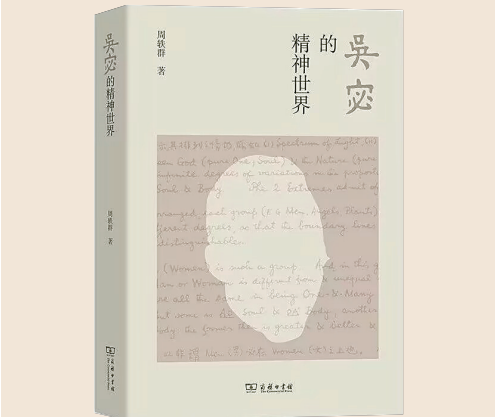
书香闲情

尺八箫



本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鉴真馆”系列之一，为刘九庵的书画真伪鉴定文集。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从摹、临、仿、代、改、造六个方面介绍中国古书画的作伪。第二部分是“书画伪作辨析”，是由1994年刘九庵赴台北讲座的笔录整理而成，首次整理出版。讲座内容为包括王羲之、苏轼、黄庭坚、赵孟頫、沈周、郑燮等在内的十几位古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真伪鉴定实例分析，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历代作伪的手段以及鉴定方法。

全书均根据文稿配以高清图版，全彩印刷，为中国古书画鉴定学习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书籍。



《吴宓的精神世界》
周群轶 著，商务印书馆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时至今日，吴宓的学术成就和主张仍未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形象也往往失之于脸谱化和标签化。有鉴于此，本书集中选取了三个点：吴宓毕生用力至勤的一个领域（世界文学），至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四大宗传）和至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通过细读其日记、诗文、年谱、书信和讲义等，力图呈现出吴宓学术和思想的具体内涵与多重维度。

作者用大量篇幅将吴宓与同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者进行对比，以彰显他对于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关系，四大宗传在人生和文学中的作用，以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等问题的独特认识。由此，我们得以理解在何种意义上吴宓作为一个忠于传统的开创者、一个高度开放的保守者和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